

“一课三歌”:壮族歌圩文化融入高职“大思政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建构

秦燕春

(百色职业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

[摘要]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大思政课”建设中,地方文化资源的转化普遍面临“活动化、表层化、碎片化”的现实困境。本研究以广西百色壮族歌圩文化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仪式性、符号性、身体性三重记忆形态,并尝试构建“情境唤醒—意义建构—行为转化”三阶段框架,进而提出“一课三歌”教学模式——课前听歌引思、课中析歌明理、课后创歌践行。该模式尝试探索歌圩文化从“文化符号”向“教育载体”转化的可能路径,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教学上的探索。

[关键词]歌圩文化;大思政课;文化记忆;一课三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G641;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711X(2026)17-0137-03

doi:10.3969/j.issn.2096-711X.2026.17.045

[本刊网址] <http://www.hbxb.net>

“大思政课”理念要求打通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与网络空间,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壮族歌圩等地方民族文化资源,本应成为落实这一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素材。然而,实践中此类资源的转化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一、现实困境

(一)活动化倾向

歌圩文化的融入多停留在“非遗进校园”等主题活动层面,学生往往作为“看客”而非“主角”参与其中,教育影响难以持续。究其根源,单纯依赖思政课进行价值引导存在边界,歌圩文化“活态传承”的特性在课程化过程中容易被稀释。

(二)表层化局限

现有探索多从“民族文化遗产”的维度切入,展示歌圩文化后却很少追问歌圩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什么内在关联。朱兴国等指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学转化,关键在于将“类的精神能量”转化为个体认知与情感,对照这个标准,当下的实践多半止步于文化符号的浅层展示。

(三)碎片化困境

碎片化困境即指歌圩文化的元素东一块西一块散落于不同的课程与活动之间,课堂教学与实践环节衔接不足。既有研究提出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与“思政大格局”构建反衬出,将歌圩文化系统嵌入思政课、专业课、实践教学实现三者联动,或许是破局的关键。

面对“活动化、表层化、碎片化”的困境,壮族歌圩文化如何才能系统性地转化为思政教育资源?文化记忆理论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将歌圩文化拆解为仪式、符号、身体三重维度的分析路径。

二、理论视角与框架分析

(一)文化记忆理论及其教育转化意涵

文化记忆理论为理解民俗文化如何进入学校教育提供了独特的概念工具。扬·阿斯曼指出记忆不仅是个体心理过程,更是通过仪式、符号和空间等文化载体实现的集体意

义生产系统。这意味着,记忆不是“保存过去”,而是“在当下建构共同体”。学校教育恰是这样一个场所——课程内容、教学仪式、集体活动等,都在持续进行着价值观念的选择、传递与再生产。因此,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地方文化资源向思政教育资源的转化时,文化记忆理论引出另一个追问:歌圩文化能否以及如何成为学生“记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媒介?

文化记忆与思政教育的关联,近年已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朱兴国等强调文化记忆需通过课程载体实现“类的精神能量”向个体认知的转化;姜仕华指出价值观的生成离不开社会实践场域;叶方兴则提出“大思政课”需处理好“大”与“小”的辩证关系。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侧重,或聚焦课程,或着眼一般性实践,但对民族地区民俗文化如何系统性地转化为思政教育载体这一更具地方性的问题,尚未给出明确回答。

(二)壮族歌圩文化的三重记忆形态

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看,壮族歌圩不只是一项民俗活动,它同时包含着仪式、符号、身体实践三个层面的东西。基于这一认识,本研究尝试将其归纳为三重相互关联的形态。

首先是仪式性记忆。歌圩是集体仪式的展演场域。个体在对歌、舞蹈中汇入群体,原本分散的情感在仪式中渐渐凝聚为归属感。这种重复发生的仪式活动,影响着参与者的身体节奏,也在反复中强化共同体的情感联结。这意味着,思政教育可以借助这种“共同在场”的力量建立认同,而不必完全依赖抽象说教。

其次是符号性记忆。歌谣的唱词、服饰的纹样、对歌的程式,都是记忆的符号载体,承载着历史叙事、价值取向和情感结构。如果说仪式性记忆营造的是“氛围”,那么符号性记忆提供的则是可被解读、可被讨论的“文本”。当教师带领学生分析百色起义时期流传的革命歌谣的歌词变迁,或解读一段当地山歌中隐含的交往叙事时,符号的解码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建构。

最后是身体性记忆。歌圩文化有别于其他非遗形态之处,在于它强调“做中学”。唱、和、舞不是外在形式,而是意

收稿日期:2026-4-17

基金项目:本文系百色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2025年度开放课题“红城壮族歌圩文化融入高职‘大思政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SHB01)。

作者简介:秦燕春(1983—),女,广西临桂人,百色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义生成的方式。学生只有真正开口唱、亲身走进“三月三”的节庆场景,歌圩所承载的集体记忆才可能从“知道”下沉为“体知”。也正是在这种身体参与中,文化认同从认知层面的“我认同”转化为行为层面的“我践行”。

三重记忆形态各有分工。仪式性记忆打开情感通道,符号性记忆澄清意义内涵,身体性记忆则使行为固化。三者共同构成了歌圩文化从“文化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的内在机制。

三、“一课三歌”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可行性论证

前文将壮族歌圩文化分为仪式性、符号性、身体性三重记忆形态,并尝试搭建“情境唤醒—意义建构—行为转化”的三阶段框架。但框架面临如何落进一堂思政课的问题。本研究尝试以“一课三歌”教学模式来回应这一难题。该模式以一堂思政课为单元,将三重记忆形态分别嵌入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形成“课前听歌引思,课中析歌明理,课后创歌践行”的育人链条。

(一)模式内涵

1. 课前听歌引思,以仪式性记忆实现情境唤醒。课前环节对应“仪式性记忆”。其用意不在让学生“学会一首歌”,而在借助歌谣的仪式性力量,为学生打开一条情感进入的通道。

选歌需要兼顾三重考量:与教学内容形成意义关联,与学生既有经验保持可及距离,与当下时代议题产生隐性呼应。讲授“革命精神”主题时,可选用百色起义时期流传的革命歌谣;讲授“民族团结”专题时,可选用当地描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山歌——其唱词中的具体人物与故事,比抽象论述更具代入感。

选歌之后,关键在于“引思”环节如何设置。如果只是播放歌曲、让学生写听后感,很容易流于形式。教师需要提供有方向感但不设标准答案的引导性问题。“这首歌让你想到了什么”指向个体经验的唤起;“它传递了怎样的情感”指向集体情绪的识别;“其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哪些精神”则指向价值层面的初步提炼。

本环节是让学生在仪式性的聆听中,与歌谣所承载的情感结构产生接触,为后续的理性分析奠定情感基础。传统思政课容易忽略的,正是这个“先动情、再明理”的过渡环节,而歌圩文化恰恰能补上这一环。

2. 课中析歌明理,以符号性记忆实现意义建构。课中环节的任务,是把歌谣从“被感受的对象”变成“可分析的对象”。歌谣的唱词承载着历史叙事、价值取向和情感结构。这背后,其实是“符号性记忆”在起作用。

课堂教学中,教师以歌谣为案例,引导学生完成从感性体验到理性认知的跨越。这种跨越的关键,在于分析歌谣时不止步于艺术欣赏或民俗介绍,而是层层推进。让学生先了解歌词说了什么、怎么说;再思考歌谣为何在此时此地出现;最后探究它背后藏着怎样的价值判断与集体记忆。

以百色起义时期的革命歌谣为例。只讲旋律优美、歌词感人,学生最多感动一下,转头就忘。真正的“明理”得带着学生追问:这首歌唱的是百色起义的哪段历史;歌里的“红军”“壮乡子弟”和今天讲的“中国共产党”,那条经由歌谣传唱而延续下来的线索是什么;还有那些反复出现的“团结”“斗争”“跟着走”,它们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存在怎样的关联。针对这些问题一一解答,歌谣就不再是文艺作品,而成了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入口。

3. 课后创歌践行:以身体性记忆实现行为转化。课前解决“情感进入”,课中完成“意义澄清”,课后需要回答的问题

则是:认知成果如何沉淀为行为习惯。这一设计对应的是“身体性记忆”。歌圩文化的核心在于“做中学”,学生做不到动口唱、动手创、亲身参与,集体记忆就只能停留在“知道”层面,无法成为“体知”。课后环节的抓手,是“创歌”与“践行”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创歌”这步,关键是让专业教育与认同教育撞出火花。学前教育的学生编童谣,得琢磨民族团结的故事怎么变成幼儿能听懂的话;计算机的学生做数字歌谣,得想明白用新媒体传递传统价值,技术上怎么实现;艺术设计的学生设计歌圩主题作品,得做好文化符号的视觉转化。每个专业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但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把认同“做”出来。

“践行”解决的是成果呈现与反馈的问题。“红色歌圩”班级展示、校园文化节这类活动,这些活动可以结合百色当地的“三月三”歌圩节庆。学生在公开场合唱出自己创作的歌谣,接受同伴和教师的回应,认同便从个体认知转化为群体确认。这种“被看见”“被回应”的经历,正是行为得以固化、认同得以深化的关键。

三个环节串起来,形成一条完整的育人路径。课前以仪式性记忆打开情感通道,课中以符号性记忆澄清意义内涵,课后以身体性记忆固化行为习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一递进中,从教学设计的预设,一步步沉淀为学生亲身经历的真正过程。

(二)资源转化逻辑

首先,从“歌”到“思”的转化,依赖仪式性记忆。歌谣的旋律、节奏、演唱方式,本身就具有情感唤醒的力量。当学生聆听歌谣时,进入的不仅是音乐情境,同时也是一个承载集体记忆的仪式场域。仪式性记忆被激活,归属感由此在情感层面萌生。

其次,从“思”到“理”的转化,依托符号性记忆。歌谣的歌词是一个符号系统,蕴含着历史信息、价值观念和情感结构。课堂深度分析的任务,就是带着学生解码这些符号。比如,可以追问“这首歌为什么这样唱,唱给谁听,它想传递什么”。一个个问题追问下去,学生的理解就会从感性层面慢慢进入理性层面。

最后,从“理”到“行”的转化,落实于身体性记忆。歌圩文化强调“唱”的实践。只有真正开口唱,才能获得完整的文化体验。学生创作歌谣、参与展演的过程,是身体参与、情感投入、价值内化的综合过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认知层面下沉为行为自觉。

三个转化环节缺一不可。没有仪式性记忆奠定的情感基础,符号性记忆的分析便容易沦为知识灌输;没有符号性记忆提供的意义澄清,身体性记忆的实践就可能缺乏价值方向;而身体性记忆的落实,则使前两个环节的成果真正固化。

(三)模式的特征与优势

“一课三歌”模式的特征,可以从情境性、参与性、系统性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三者并非简单的分类,而是相互支撑、层层递进。

1. 情境性。模式以歌谣为媒介创设学习情境,歌谣来自学生熟悉的地方文化,这种“在地性”缩短了“他者”与“我者”的心理距离,思政教育由此从“被接受”转向“可亲近”。

2. 参与性。课前听、课中析、课后创,学生不再是坐在台下听讲的人,而成为全程参与者。这一设计背后,是对高职学生“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实践导向强于理论偏好”学习特点的考量,课堂获得感不再靠教师单向输出,而在学生的主动参与中一点点沉淀下来。

3. 系统性。模式将课前、课中、课后串联成一条育人链

条。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认知教育与情感教育、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被这根链条串在一起,不再是各说各话。文化资源融入思政课的“碎片化”困境,也就在这种环环相扣中得以化解。

(四)模式的可行性论证

这一模式与高职学生的认知特点形成呼应。高职学生普遍具有“形象思维优于抽象思维、实践导向强于理论偏好”的学习特征。以歌谣为媒介,把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体验;壮族歌圩文化中天然的对歌竞赛等互动形式,恰好契合了学生对实践性学习的偏好。

模式与“大思政课”建设要求存在内在一致性。“大思政课”强调课堂与社会的协同,“一课三歌”模式通过“红色歌圩”把社会实践引入教学流程,让知情意行的统一不再停留于理念层面,而成为可操作的教学设计。既有研究提出的“三位一体”工作机制与“思政大格局”构建,为歌圩文化嵌入思政课程、专业课程与实践教学的联动设计,提供了制度参照。

模式根植于民族地区的文化禀赋。民族节庆非遗本身蕴含着立德树人的教化价值,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歌圩文化的活态传承特性,与“大思政课”的实践导向高度适配;而红色文化与歌圩文化的融合,则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双重维度贯通起来。

三个层面缺一不可:认知基础决定了模式“行得通”,制度接口决定了模式“推得开”,文化资源则决定了模式“立得住”。三者共同构成了“一课三歌”模式在民族地区高职院校落地实施的可行性基础。

四、结语

将地方民俗文化转化为育人资源,是民族地区高职“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命题。本研究以广西百色壮族歌圩文化为切入点,将其分为仪式性、符号性、身体性三重记忆形态,并尝试构建“情境唤醒—意义建构—行为转化”三阶段框架,

进而提出“一课三歌”教学模式。这一路径尝试呈现民俗文化从“文化符号”向“教育载体”转化的一种可能,为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教学上的探索。破解当前地方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三化”困境,需要更多此类根植地方、贯通理论与实践的尝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17): 4-16.
- [2] 蔡倩. 以大思政课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S1): 45-49.
- [3] 朱兴国, 郭本禹. “大思政”观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体化建设[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44-51.
- [4] 张立杰, 秦文宇. 党史学习教育视域下“大思政课”创新研究[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19): 41-43.
- [5] 楚国清. 善用“大思政课”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7): 25-27.
- [6] (德)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 姜仕华.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何以融入“大思政课”教学[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4(3): 78-81.
- [8] 叶方兴. 课程论视域下“大思政课”建设的理论意蕴与实践路向[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3(10): 95-101.
- [9] 李春晖. 大中小学思政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内容的螺旋上升式构建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3): 71-77.
- [10] 王枬, 蒋慧. 人口较少民族节庆非遗的育人价值与实践路径——以高校设计教育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 2024(5): 78-86.

“One Course, Three Songs”: Pathway Construction for Integrating Zhuang Ge Xu Culture into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Foster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QIN Yan-chun

(Baise Vocational College, Baise Guangxi 53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located in ethnic region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is commonly confronted with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being “activity-oriented, superficial, and fragmented.” This study takes the Zhuang Ge Xu (song festival) culture in Baise, Guangxi, as its research object, categorizing it into three forms of cultural memory—ritual, symbolic, and embodied,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hree-stage framework of “situational awakening—meaning construction—behavior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proposes a teaching model called “One Course, Three Songs”, which involves listening to songs before class to stimulate reflection, analyzing songs during class to clarify principles, and creating songs after class to apply the learning. This model seeks to illustrate a possible pathway for transforming the Ge Xu culture from a “cultural symbol” into an “educational vehicle”, offering a pedagogical exploration for foster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Ge Xu cultur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cultural memory; One Course, Three Songs;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陈思婷)